

導演和曉丹

寧靜地創作 在電影中與故人相遇

從重慶大足小城到北京電影學院，再到遠赴加拿大蒙特利爾，導

演和曉丹的人生軌跡如同一部跨度數十年的公路電影。和曉丹是加拿大第一位獲得政府資金拍攝故事長片的華裔導演，曾執導故事片《蒙特利爾，我的美人》、《春色撩人》、《開羅來信》，及紀錄片《星星的舞蹈》、《我的父親和他的憂鬱》、《迷失的摩梭》等，用鏡頭講述着關於女性、關於困境、關於希望的故事。在一個陽光溫和的下午，我們聊起了她的電影人生，關於最初的感動，關於創作的陣痛，也關於一個創作者如何在這條路上找到自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

和曉丹接受訪問。
記者：丁寧攝



和曉丹在電影攝製現場。受訪者供圖

18歲那年，和曉丹從雲南來到北京電影學院。在此之前，電影對她而言還相當遙遠。「那個時候的中國沒有機會看到太多的電影，我也沒有對電影有那麼強的感受。」但進入電影學院後，一切都變了。

如果非要找到那個「最初瞬間」，和曉丹會毫不猶豫地提到侯孝賢。「我看的第一部應該是《風櫃來的人》，看完以後我就說：天吶，電影可以這樣地真實！」回憶起那個夜晚，和曉丹的眼中依然閃爍着光。侯孝賢鏡頭下的小城青年，那種真實而樸素的狀態，一下子擊中了她。「我是有小城成長經歷的人，在大足長大，從那個地方一直到昆明，到北京，再到國外。當看到侯導的電影時，我十幾歲在大足的生活經驗一下子就連接起來了。」那是一種難以言說的鄉愁，一種被看見、被關懷的溫暖。「我回到宿舍哭了一晚上，也不知道具體感動什麼。但現在回憶起來，我知道我感動的是什麼——那種真實的魅力，普通人直面命運的力量。」

侯孝賢之後，波蘭導演奇斯洛夫斯基成為了她的第二位「電影聖人」。「《兩生花》是我覺得最美的電影，至今我都認為那部電影在美感和神秘感上完全征服了我。光線、鏡頭、美術、演員的狀態、音樂的整體融合，太享受了。」而第三位，是伊朗導演阿巴斯。「他感染我的是那種詩意和樸素。」用非職業演員、極少的經費，就在伊朗鄉村拍攝，卻帶出了很深很深的詩意內涵。「我覺得他是一位電影詩人，很純粹，那種境界高不可攀。」

侯孝賢給了她真實的力量，奇斯洛夫斯基給了她美感的震撼，阿巴斯給了她詩意的啟迪。和曉丹笑稱這三位是她的「電影三聖」，「18歲愛上了電影，完全被征服了」。

劇本就是電影的本質

和曉丹所有的故事都是自己編劇。「因為我從小就喜歡寫作，寫劇本的過程就是挖掘故事的過程。」她特別認同黑澤明的一句話：「一個導演，你要成為導演，要從寫劇本開始。你不會寫劇本，就不能真正了解電影的本質。」

對和曉丹而言，寫劇本不僅僅是寫。「編寫的時候，腦子裏已經在拍電影了。我和我的故人相遇，這個相遇是慢慢聚焦的過程，把他的命運藍圖看得越來越清楚。」三四年創作的過程，邊寫邊在想像的世界裏與人物相處。「後來當這些演員真正出現的時候，我竟然有一種與故人相遇的感覺——他們從我想像的世界裏出來了。」

但如何知道改到了「對」的版本？和曉丹用一個生動的比喻回答：就像女孩子要去見熱戀中的男友，試了一件又一件衣服，總覺得哪裏不對。直到某一刻，在穿衣鏡前一看，「哎，這個樣子是對的」，而約會的時間也到了，不能再囉嗦了。「拍電影也是這樣。製片人會告訴你，下個月1號開機了，劇本要交出去了。那個鈴鐺響了，約會的時間到了，你要出門了。」當然，劇本可以80%滿意，剩下的，和曉丹寄望於拍攝中的「神來之筆」。「有的時候即興發揮，電影之神會給我一個禮物。」



和曉丹（右）與演員陳沖（中）在工作中。受訪者供圖



《蒙特利爾，我的美人》劇照 受訪者供圖

在創作方法上，和曉丹有一個「小秘密」——人物庫。「我從小喜歡觀察各種人，地鐵上遇到的，大堂裏碰見的，有的人形象太鮮明了，讓你這輩子都忘不了。」這些人存在於她的腦海裏，形成了一個無形卻有形的人物庫。「你要寫人物的時候，你就有資源，調出來就好了。」

相比人物，和曉丹認為結構才是最大的挑戰。「結構對我來說比人物還難，但它有無限的可能性。如果結構把握好了，我會更踏實。節奏上一定要成立，要有巧思。」至於對白，則是她最享受的部分。「想像人怎麼說話，也

來自觀察。用最少的話說出最多的言外之意，這是編劇應該追求的目標。」

創作的底色是悲憫之心

在創作之路上，和曉丹也曾陷入低谷，懷疑自己的才華是否足夠。但陣痛期並沒有太長。「當我回到創作本身，反而覺得最安全。我拋開了其他憂慮，說那我就全力以赴試一次。與其猶豫、懷疑，不如什麼都不管，全心全意投入創作。」

「做藝術要豁得出去，而且要願賭服輸。」和曉丹說，「它有點像賭博，你付出四年，要心甘情願。就像愛上一個人，無法知道是否能白頭到老，你還願意去愛嗎？如果付出了一切能如願，是最好的結果；不能，你是否會後悔甚至怨恨？」她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我自己知道，不嘗試我會遺憾終身。嘗試了沒有結果，沒關係，我願意承受。」

從大足到昆明，從北京到加拿大，多元文化經歷給了和曉丹更豐富的維度。「我慶幸25歲才走出去，行囊裏已經裝了中國文化最優秀的和我愛的東西。」她不認為走出去就更優越，「但它給了我多一個視角，變得更豐富。最後落腳點還是創作者自己，你最關注的是什麼？你的價值觀、審美是什麼？」

而和曉丹最關注的，一直沒有變過。「我對人的悲憫心沒有變，這是我創作的底色。」她提到張愛玲筆下的蒼涼感，但她說：「我更願意說悲憫。從小我就是一個很有同情心的小孩。年紀越大，對人的困境、掙扎，複雜性的理解越深刻，這種悲憫就越深。」但同時，「我希望我的作品給人希望，給人勇氣。哪怕是剖析困境、悲傷的故事，也要有希望。」

作為女性導演，和曉丹並不刻意強調自己的性別。「我不是一個愛賣慘的人。工作中我要求被尊重——把我當人，尊重我就好。」她認為，太在意女性導演的身份，反而把自己放到了弱勢地位。「自尊、自立，盡自己的本分，自強者天助。」

「要做一個快樂的旅行者」

對於正在路上的年輕創作者，和曉丹给出了這樣的建議：「不要投機，不要等到覺得自己的水平夠了才去做，沒有這個刻度，你不知道自己的潛力有多大。每做一個電影都是一次旅程，你出發了，四年後才能到達。你能確定到達什麼地方嗎？你只能去完成這個旅程。」她鼓勵大家多看藝術家的傳記。「你會看到他們也曾經是年輕人，無知的、彷徨的、懷疑自己的、失敗的。你會祛魅，會不再那麼害怕。你需要做的，是認真對待自己的人生，度過每一個關口，做有心人，付出努力。」

而最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主心骨」。「要誠實地面對自己，不要害怕缺陷。要向內看，了解自己。你越了解自己，才能越好地對抗外界。堅持什麼價值觀？什麼是不行的底線？找到自己，走屬於自己的路，不要害怕。把它當成一個快樂的過程，像一個快樂的、好奇的旅行者，勇敢地去探索。」

訪問接近尾聲，記者問和曉丹：如果十年後的你要拍攝此刻的你，會用哪三個關鍵詞？她想了想，認真地說：「悲憫、寧靜、自信。」和曉丹說，「如果不寧靜，我沒法專注創作。」這或許就是一個創作者走過萬水千山之後，最珍貴的狀態。



1977年的歌劇《蝴蝶夫人》劇照。圖片來源：盧景文

歌劇《蝴蝶夫人》對香港歌劇發展史具有深遠的象徵意義。女高音江樺早在1959年，就在羅馬以利斯奧劇院演出《蝴蝶夫人》，成為首位登上意大利歌劇院舞台的華人女歌唱家。在當時，華人歌者能進入歐洲歌劇體系極為罕見，她更在歌劇的發源地獲得當地觀眾與專業人士的認同，實力深厚，非同凡響。江樺在羅馬認識了有「香港歌劇之父」之稱的盧景文，二人同樣對藝術充滿熱誠，回港後在

夫人化蝶：江樺飛去了

1964年的香港大會堂上演《蝴蝶夫人》。到1977年，再上演《蝴蝶夫人》時，規模已達到專業水準：聘用外國演唱家和指揮，超過八十人的現場樂隊伴奏，呈現華麗的布景服裝、燈光等等。江樺演唱的代表作《蝴蝶夫人》，正是香港歌劇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恩師女高音江樺，享年97歲。她的一生猶如一部活生生的香港歌劇發展史，見證着香港歌劇由萌芽階段發展到現今大眾能透過香港電台和電視台輕易接觸到的豐碩成果。她一直與盧景文把西洋歌劇帶來香港上演，當時香港的歌劇仍在起步階段，資源不足，製作經驗亦有限。從排練、選角、翻譯、合唱團，甚至抄寫樂隊譜，到演出場地與觀眾培養，幾乎全部都要由零開始。江樺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參與和建立本地歌劇的基礎。由於她曾是電影明星，演出的著名劇目均大受歡迎，讓本地觀眾逐步接觸並理解歌劇，她和盧景文的合作扮演了開

荒牛的角色。讀者若欲探究這段歷史，可參閱其自傳《江樺：我的藝術生涯》和《香港歌劇史——回顧盧景文製作四十年》。

筆者想談的不只是藝術的歷史，還有藝術家的修養，江老師絕對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對自我要求嚴格，在教學上，更有一本學生名冊，清楚記錄入門時間經過，甚至編配學生編號。每到下午，她會邀請學生一起飲下午茶，吃西式茶點，慢慢聊天。談的不只是歌唱技巧，還談歌唱家的修養，分享她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對自己聲音的保養要求極嚴謹，即使步入晚年，仍堅持每周游泳、健身，起居飲食極有規律。她常言道：「我是唱歌的，聲音必須保養，身體不健康便不能演出了。」對她而言，歌唱家的修養，不只是技巧，還有對聲音與身體長期的保養。

我在演藝學院修讀期間，亦見證她對同行的情誼。當她的歌唱家好友Michael Rippon於2004年離

世時，已年屆75歲的她仍親自登台演唱《蝴蝶夫人》中的《Un bel di》為Michael Rippon的獎學金基金籌款。當年更是現場樂隊伴奏，但她的聲音依然極具穿透力，震動全場！她的演繹極為細膩，每一句歌詞、每一個字的處理都經過精心設計和演繹；她的目光與情感，使觀眾彷彿看見一個真實的蝴蝶夫人——那一刻，她已不只是歌唱家，而是蝴蝶本身。

我亦有幸成為這段歷史的見證者。近年香港電台電視台開始播放歌劇節目，江老師每次都十分高興，會用平板電腦反覆觀賞，亦樂於與學生分享。對她來說，生活始終離不開歌劇。

江樺不僅是香港歌劇舞台上的先行者，更是將西洋歌劇引入本地的奠基者。她的努力與成就，讓香港歌劇從萌芽走向成熟。她的名字，將與《蝴蝶夫人》一同銘刻在香港歌劇的史冊之中。藉此機會，我很想向江老師致以最後的敬意。 ●文：梁笑君 Cindy